

《告别理性》一书对强调“进步”和“发展”观念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猛烈挑战,后者对社会的损害和生态的后果现在已被人们广泛认识到。本书所有的文章都坚持一个哲学目标,不论是讨论希腊艺术和思想,还是为教会对伽利略的斗争做辩护,或是探求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抑或揭露卡尔·波普尔的教条主义,费耶阿本德均捍卫了科学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他坚持认为,对理性的追求是空的,它必须被从属于公民和共同体需要的科学观念所代替。

挑衅,争论,严密的证明。《告别理性》一书激怒了费耶阿本德的批评者,并令他的众多拥护者兴奋不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告别理性/[美]费耶阿本德 陈健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现代思想译丛 张源主编)

陈星苑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I ①告 ②费 ③陈 ④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00000 号

云枫图书社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书 名 告别理性

著 者 [美]费耶阿本德

译 者 陈 健 柯 哲 陆 明

责任编辑 汪意云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张源号 张源)

网 址 张源: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开 本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印 张 张源 插页 圆

字 数 张源千字

版 次 张源年 张源月第 张源版 张源年 张源月第 张源次印刷

标准书号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张源

定 价 张源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导 论	员
第一章 关于相对主义的注释	園
第二章 理性、色诺芬尼与荷马诸神	源
第三章 知识与理论的角色	園
第四章 创造性	苑
第五章 科学和艺术在哲学中的发展	猿
第六章 琐碎的知识 对波普尔哲学之路的评论	缘
第七章 马赫的研究理论及其与爱因斯坦的关系	怨
第八章 亚里士多德的数学和连续性理论	園
第九章 伽利略与真理的专制	園
第十章 普特南论不可通约性	怨
第十一章 文化多元论还是勇敢的新一元论	猿
第十二章 告别理性	远

导 论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论述了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转型的问题。它们试图说明当同一性减少我们的快乐和我们的(智力的、情感的、物质的)财富时,多样性是有益的。

有些强大的传统势力反对上述观点。他们也承认人们也许会以多种方式安排生活,但他们补充道,多样性必须有所限制,这种限制由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和限定人们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自然准则所组成。哲学家们,从柏拉图(马德森译)到萨特(陈永发译),和科学家们,从毕达哥拉斯(马德森译)到蒙那得(陈永发译),他们都曾主张制定这些准则。他们也都曾对仍然存在的多样性(价格、信仰、理论方面)抱怨过。

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这些抱怨急速增长。我们常听到“当代文化处在危机中”的说法。它被深刻的矛盾所撕开。矛盾双方一方是传统人文主义者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另一方是没有机械论描述的科学的价值。此外,古典文学、哲学、艺术和社会思想被“文化失谐”和“哲学疾病”所侵蚀。这种极端观点是某些批评家观察到的分化。就像尤尔根·哈贝马斯(陈永发译)最近所说的新无调查能力者:人们很难在浸没大众生活的式样、理论、观点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出路。^①这些抱怨惊人地相似。“文化”时常变得混乱这是事实,这种趋势不是新的,并且被强有力的反向趋势所平衡:一些学派胜过、蔓延到和吸收其他

学派,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创造了交叉学科(例如:合作反射、分子生物学),宏大的统一计划(进化论、整体论、身心问题的二元解决方案、语言学理论)使重要的区别变得模糊,电影、计算机艺术、摇滚音乐、高能物理学[参考 粤皮克林(粤世赠马赠赠赠赠的引人瞩目的论文《构造夸克》,芝加哥 员愿年]以一种与 员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相似的方式同商业原则、艺术灵感和科学发现结合起来,分化存在,但也存在新的、强有力的统一。

批评家们所表现出的缺乏预见性更使人吃惊。他们所说的“当代文化或世界文化的危机”指的是西方学院的和艺术的生活,但同西方商业、科学和技术传播的稳步增长相比,关于教授的争论和西方艺术的扭曲变得不重要了。西方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为特征,并独立于意识形态、种族和政治的差别,西方文化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和文化。上述情况锻炼了我们知识分子,这是毋庸置疑的,得到强大的团体和机构智力上和政治上支持的一系列统一的观点和实践被加强、输出和再加强。^②现在,在地球最遥远的角落都能发现西方生活方式。在 愿年代前还不知道西方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也被改变,文化差异消失了,土著技术、习惯和组织被西方的所代替。下面一段话摘自美国寄生学学会一篇主席演讲,其中对这个过程有精辟的描述:

工业化时代前的土著社会的本质是它们的多样性和本土化。每一种都与特定的居民相联系,并且发展出自己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多样性的居民产生了同样多样性的人类社会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环境约束。

与此正相反,工业技术发展的特征是一个受控的、

相对统一和高度简约的环境,它通常将物种的种类减少到一些教化的形式,包括人类、偶然定居的植物和动物。……高度的环境恶化和广泛分散的均质化是世界上所有政治和经济系统工业化社会的特征 [唐纳德·海纳曼 (Donald H. Nauman),《寄生虫学会杂志》1980年,第100页]。

弗朗科斯·雅各布 (François Jacob) 的简明结论是“我们受到单调性的威胁”(《可能性和现实性》,西雅图和伦敦 1974年,第100页)。西方文明自身丧失了太多的多样性,以致一位美国作家在 1984年 9月 10日的国际先锋论坛中写道:“像扩散的雾,同一性吞没了全国(指美国)。”同自然、社会和技术同一性的巨大趋势相比,使文化批评家们不快的冲突变得不可见了。

同一化的趋势是无益的,即使通过那些至今仍鼓励它的人的价值观来判断。世界范围的生态学问题被人们广泛地描述和理解。许多人通过自身的经历了解它(河流、海洋、大气和地下水的化学和放射性污染 臭氧层的减少 动物和植物种类数量的急剧减少 森林的减少和土地的沙漠化)。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诸如饥饿、疾病和贫穷,看起来是西方文明的稳步发展造成的,而不是被它所加重的。^③ 对于许多社会来说,获得知识是生活的一部分 获得的知识是相对的,同个人和群体的关注方面有关。学校、教养和“客观”知识同当地状况和问题的分离使它的认识上的成分变得不存在,并使它变得荒芜和没有意义。这里,西方通过将学校和生活分离并使生活面对学者式的规划,从而导致了这种方式。^④

对典型土著文化及其全球联系现象的研究表明,生活方式有许多种。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对特

定环境的适应性。他们发现了而不是错过了美好生活的秘密。即便是军备控制之类的高科技问题也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而是被“主观”所渗透。例如，文化组件^⑤。在我已经引用的雅各布的一段中写道：

“在人类中”，自然多样性……被文化多样性所加强。这使人类更好地适应多样的生活并更好地利用世界的资源。然而现在我们受到单调性的威胁。人类在信仰、风俗习惯和组织上非同寻常的多样性正在日益减少。不管是人们生理死亡，或是在工业文明提供的模型影响下被同化，许多文化正在消失。如果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无聊的世界上，那里只有一种技术，洋泾浜式的说话，同一性的生活，那么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必须更好地使用想像力（雅各布，~~责难~~）。

本书所收论文通过批判反对这个观点的哲学家而支持这个观点。

尤其是，我将批判两种使西方式扩张在智识上受尊敬的思想——理性的思想和客观性思想。

说某一程序或一种观点是客观的，也就是声明不分人类的期望、思想、态度和愿望，它都是有效的。这是当今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一个基本观点。然而，客观的思想比科学要早并与之无关。当一个国家、部落或文明通过（身体上和心理上的）规则确定其生活方式时，它就出现了。当具有不同的客观思想的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在一起时，它变得更明显。对这种事情有各种反应，我提及了三种。

一种反应是坚持我们的方式是对的，我们无需改变。平静

的文化试图通过避免接触而避免改变。例如披米族(马来西亚)或菲律宾的明多罗(云里),他们不与西方入侵者打仗,他们也不屈服,他们就简单地从西方的影响范围内迁走。而更好战的民族会使用战争和谋杀来根除不符合他们希望的文明。乱爱吉林(乱爱吉林)写道:“摩西法中充满着许多对坎纳(坎纳)的乔伊人(乔伊人),特别是对城里的居民实行狂热的种族灭绝的血腥想像。制定对乔伊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动机是厌恶他们崇拜其他的神而不是耶和华:《申命记》中的以色列战争是宗教战争。把战争看作是灭绝视野内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的工具,这种观念是对《申命记》的革新……(《秩序和历史》,第一卷:《以色列和天启录》,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1971年)。西方文明的代表虽然也喜好人道主义的口号,但并不总是反对这种观点。

持续性表征了(物理和社会)科学方面许多最新进展。这些发展是整体的,强调历史进程而不是宇宙法则,并使“真实性”从观察者和被观察物的(通常是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那些鼓励这种趋势的作家 博姆(博姆),詹斯赫(詹斯赫),马图拉那(马图拉那),普里高津,瓦拉(瓦拉),“发展认识论”支持者和其他一些人]通过显示这种持续性以及显示它多么适应他们的规则来消除文化多样性。不是对个人的社会选择提供准则,而代之以后退到他们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这里解释为什么事情曾经是那样,为什么现在是这样,而且将来它们会怎样。这非常像过去的客观主义,只是用革命和伪人道主义的语言包裹了起来。

第二种反应是投机主义 相互冲突的文化(的领导者)比较各自的组织、习俗、信仰,接受并适应那些他们认为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历史状况、参与者的态度、他们的忧虑、需求和期望。它也许会导致文化内部的巨大斗争,它甚至也许会被天气的临时变化所影响。天气会夸大某些错误并消

除另外的。无论如何,文化的投机的遭遇不能被减少到一个一般的尺度。文化投机主义被个人、小组和整个文化所实践(并仍在实践)。一个例子是青铜器晚期居住在近东的民族、王国和部落。埃及古生物学家亨利·布雷斯特(亨利·布雷斯特)称之为“第一次国际化”。这些王国、民族彼此之间常发生战争,但他们也交换物资、语言、工业、方式、技工,比如建筑家、航海家、没落文人甚至神[详见 裁瑟弗·伯斯特(宰瑟弗·伯斯特):《从迈锡尼到荷马》,纽约 员愿年]。另一个例子是蒙古帝国。马可·波罗证实了胜利者成吉思汗对外来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并且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改变它们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大汗自己认识到了外国风俗的重要性。一位建议者曾试图通过摧毁城市使他们自己的游牧式生活习惯统一化。大汗反对这种主张。另一个有意思的现代例子是卡伦·布利克森(卡伦·布利克森)的肯尼亚的本土人(见 隆迪尼森的《走出非洲》,纽约 员愿年,第 缘页注),他们由于结识很多种族和部落因而是更完整的人,相对于市郊或省城的定居者来说——这些人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成长,有一套固定的观念。

第三种反应是相对主义:习俗、信仰、宇宙观并不简单是神圣的、正确的、真实的。他们对一些社会来说是有用的、有效的和正确的,对另一些则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无效的、不正确的。正如我在第一章中介绍的,相对主义有许多形式,一些是凭直觉的,未经深思的;另一些则具有高度的智慧,它比一些有智慧的批评家所认为的还要广泛。比如,想逃离西方生活方式的披米人就是相对主义者而不是教条主义者——假设他们在乎这当中的差别(见 悦瑟弗·伯尔的“披米族的教训”,《科学美国》 员愿年(员,员愿年))。

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希腊人介绍了另一种方法处理文化多样性。他们试图将其分为正确的方式和错误的方式,他

们既不依赖于坚持传统,也不依赖于特定的改变;他们依靠辩论。

现在辩论已不是新发现。辩论出现在任何的历史时期和任何的社会中。它在机会主义方法中有重要的作用:一个机会主义者必须问自己,外来事物能怎样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且它们将会带来其他哪些变化。偶尔“原始人”会同试图把他们变为理性主义者的人类学家论战。针对这种事情埃文思·艾瑞查德(Edward Sherry Eviatar)写道:“让读者自己思考任何的辩论,那些会使艾占得(在艾占得所宣称的其神论的威力完全消失的辩论”(威切克拉夫特:《艾占得的神论和魔术》,牛津,1964年,第100页注)。如果使用艾占得的思考方式,那么他们整个的信仰结构是值得支持的。因为他们的神学概念是完全连贯的,通过逻辑纽带网相互联系。它们是如此地有组织,以致从不与经验相矛盾。相反,经验看起来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我是说”,埃文思·艾瑞查德补充道,“我发现这(例如,询问日常事情决策的神谕)同其他我所知道的方法一样,也是一个处理家庭和事业问题的满意的方法”。辩论,就像语言、艺术或礼仪,是广泛存在的,但也如同语言、艺术或礼仪,它是多样的。一个简单的手势或一声抱怨能使一个辩论满足一些参与者,而其他需要长时间和生动的演说才能使之信服。辩论在希腊哲学家们开始考虑它之前就已经被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希腊人真正发明的不是辩论,而是一种特殊的和标准化的辩论方法。他们认为这与辩论发生时的情况无关。这个标准有广泛的权威。所以古代认为真理与传统无关的思想(它可被称为一种客观的物质概念)是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问题,它已被不太古老的认为寻找真理的途径与传统无关的思想所代替。现在合理地使用前提意味着使用这些方法接受其结果。

客观的形式概念存在着与物质概念相似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形式”程序在一些世界有意义,而在其他地方变得很傻。例如,随着日益广泛的解释而产生的无休止的批评的要求在一个有限的(定性的和定量的)宇宙里崩溃了。倾向于分裂式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物质安全和精神职责,也许会因为伦理的原因而被拒绝:一些人更喜欢稳定的繁荣的世界而不是经常地适应新思想。寻找反驳的证据并严肃对待它们的要求会导致一个按次序发展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中反驳的例子很少,并以很长的间隔出现,比如大地震。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能提高、建造和平的生活,从我们的一种理论到另一种驳斥它的理论。但所有这些是不可能的,如果理论被“异常的海洋”所包围,而这是大多数社会事务的实际情况(参考我的《哲学论文》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坎布里奇,马萨诸塞)。把基本信念客观化的习惯或研究成果在一个有一些补充形式的社会里和一个接触并适应相邻社会的社会里变得毫无意义。在一个认为老妇人拥有“圆润的、甜美的好嗓子”的世界里,无矛盾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伊利亚特》,猿猿猿猿)。结论是清楚的:文化多元性不能被客观真理的形式概念所驯服,坚持某一特定形式概念的人易于出问题(在他们看来),就像世上某一特定概念的保卫者一样。

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储量稳步增长。客观性的形式概念不仅用来创造知识,也使之正统化,例如:显示已经存在的信息体的客观有效性。这导致了更深远的问题:世界不存在有内涵并且与导致现代科学上升和发展的事件相兼容的一般性规则的有限集。人们发现,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所保卫的形式需求与他们所支持的发展集相冲突。为了解决冲突,需求被不断地减弱,直到它们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⑥

科学家们也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暗中破坏研究的普遍原

则。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可以作为科学参数的一部分而被提问,而且科学能因此而前进。这正是量子理论里所发生的,在诸如马图拉那和瓦拉的心理学研究里,在马赫(马赫)的知觉心理学调查里,谁会想到宇宙起源的“矛盾的”(爱丁顿)和“神学的”(霍伊尔)理论重新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计算和哈勃及其他的一些发现精确地导出这个结论。谁会想到科学能被明确的反面证据所支持并从中受益?但爱因斯坦不止一次地嘲笑那些对“无用的证明”的关心,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取得进展。看一下老的量子理论的研究历程或发现科学结构的发展进程,它表明靠逻辑上严格的辩论导致科学发展的想法只是一个梦。^⑦当然,所有基本的混沌的程序是严格的——但它的严格是符合情况的、复杂的,同我们缺少天赋的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的“客观的”严格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和不同。^⑧

在保护西方文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二种思想是理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思想。正如客观性概念一样,它具有一种物质的和形式的变体。在物质的观念里要成为理性的,意味着避免某些看法并且去接受另外的看法。对早期基督徒中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诺斯替派,连同它的有色统治阶级及其奇怪的发展,是非理性的。今天,非理性意味着,比如,相信占星术,相信灵魂创造说,或者对于不同的群体,相信智慧的种族起源。在形式意义上的理性意味着遵循某一过程,顽固的经验主义者把与实验相矛盾的清晰的观念视为非理性的,而顽固的理论主义者嘲笑那些只要事件有一星半点变化就修改基本原理的人的非理性。这些例子表明,几乎不可能让诸如“这是理性的”或“这是非理性的”这样的陈述去影响研究。概念是模棱两可的,几乎不可能得到清晰的解释,企图强迫它们将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非理性”

过程常常导致成功,而“理性”过程可能引来大量问题。严格说来,我们这里有两个词:“理性”和“合理性”,它们几乎能和任何思想和过程相连,因而环绕着它们的是一大堆优点。但是这两个词究竟如何发挥它们巨大而美丽的力量呢?

假设存在着大量有效而必须遵守的知识和行动的标准,这个假设是信仰的一种特殊情形,该信仰的影响远远超出知识分子争论的范围。这个信仰(对它,我已经给出了一些例子)可以这样形成:通过声称存在着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世界必须去接受它。这个信仰大大地博得了穆斯林的欢心;它伴随着十字军进行血腥的战争;它导致了新大陆的发现;它导致了断头台,今天它为科学、自由和尊严的自由论者和马克思主义捍卫者无休止的辩论提供着原料。当然,每一种运动都对其信仰加入它自己的特殊内容,当困难出现时它就改变其内容,当个人或群体利益面临侵害时它就曲解它。但是如下的思想总是起着而且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即存在着这样一种内容,它普遍有效而且它为干预进行辩护(正如我上面已经指出的,这一思想甚至被客观论者和还原论者持有)。我们可以猜测,当重要的内容从一个中心、一个王国或一个不容抗争的上帝——它们支撑并给予世界观权威——那里逃遁时,剩下的只是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理性和合理性是相似王国的权力,它们被同样的光环所包围,如上帝、王国、暴君及其残忍的法律。内容已经逃遁,光环留了下来,它使得权力苟延残喘。

内容的缺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促使特殊群体声称自己为“理性主义者”,去声明大量被认可的成功是理性的杰作,去运用力量而获准对与他们利益相冲突的发展进行镇压。毋庸置疑,这些声明中的大多数是虚假的。

我已经提到过科学的情形:他们超越一种循规蹈矩的方法,

但是发生的模式是不稳定的,因而不能被推广。启发,被声称是理性的另一个礼物,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真实的。“启发”,康德写道(“什么是启发?”^①),^②援引贝尔指出。见《康德论历史》,自由艺术图书馆 1956年,第 171 页),“是男人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的释放。不成熟是男人在他人没有提供直接答案的情况下不能利用他的理解力。自我招致就是这种不成熟,当它的起因不在于缺少理性,而在于缺少解决答案时。”此句中的启发在今天是很罕见的。公民从专家那里而不是从独立的思想中得到线索。这是今天“成为理性的”含义。个体、家庭、村庄、城市生活中不断增加的部分被专家占据了,当一个人说“我感到抑郁”时,很少不会听到反问“难道你是心理医生?”^③“如果我有一本能理解我的书”,康德很久前写道,“一个能让我觉醒的牧师,一位能决定我饮食的医生,等等,我就不必麻烦我自己了,只要我付费,我不必思考了——他人乐意为我承担这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的确,存在着而且总是存在着理性的希望,总是存在着那样的人,他们与陈规作斗争并捍卫在他们看来是正当的个体生活、思考、行动的权利。整个社会,一直追溯到“原始”部落,已经教导我们,理性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它也许会受阻,但最终会进步的。科学家正在超越研究的传统界线,不管在小社区还是在大范围内的公民都在检验影响他们的专家的决定。但是这些比起日益增长的集权(大规模的技术和相似机构带来的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来,只是小小的恩惠而已。

这把我引到了自由之路上。我们所拥有的而千百万人民仍然缺少的令人舒畅的自由很少是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的——它们来自把很多因素考虑在内的斗争和妥协,其结构不能被覆盖了所有情形——从克莱塞尼兹(雅典政治家)到曼德拉——的普遍原理所解释。每一场运动都有它自己的政策、它自己的体会、

它自己的构想 每一次奋斗都会赋予这个强有力的词——自由——自己的含义。当然,猜测个人奋斗经历并从中引申出一堂“政治课”,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没有具体确实的政策,其结果总是盲目的、无用的、误导人的、不现实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运用最枯燥无味的口号和最空洞的“原理”去兜售和强加一种协调一致的、意味深长的世界观。这并不是在鼓舞自由,而是在哺育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披着一件自由的外衣。

把这些认识和科学家通过研究当地人民物质和精神成果所获得的真知灼见相结合,我们会发现,排斥了文化多样性,科学本性一无所有。文化多样性与被视为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的探索的科学并不矛盾,它与“理性主义”、“科学的人类主义”和有时被冠以理性的一种力量——运用死板的、歪曲的科学想像为他们陈旧的信仰去获得接受者——诸如此类的哲学相冲突。但是理性主义没有得到确证的内容,理性也不具有超越偶尔碰巧名副其实的政党的原则的议程。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驱使把种出卖给属,走向单调性。该是让理性脱离这种驱使的时候了,因为它已经被这种联系彻底地损害,是时候命令它告别了。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只是故事的一方面,即很多事情是受理性所害,而不是受它之助。另一方面是理性名不副实。它歪曲成就,超越自己的界限,因而它至少应该对这种以它的名义扩展的越界负部分责任。我接下去的论述就是对付这种被歪曲的政策推行所造成的错误意识。

我始于在理性的本质上暗中搞破坏的一种哲学家,名曰理性主义。因讨论需要,我把单一的“理性主义”融入一系列主题之中,从最朴素的和几乎毫无价值的断言(尽管这里也存在着对象)开始,逐渐推进到更大胆的,遗憾的是,也是更专门性的断言。我的目的是表明,理性主义是合理的、高尚的,比通常的假

定更加宽泛。

接着,在第二章我推出了西方第一位知识分子色诺芬尼。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一位生动的智者;他不反对开玩笑,也不玩弄辞藻,他对传统的批评,尤其是对荷马诸神的批评已经得到来自不同作者的表扬,他们是 忒奥伊里亚得(忒奥多罗斯)、宰援运斯援古特里亚(宰援运斯援阿波罗)、卡尔·波普尔(卡尔·波普尔)以及弗兰茨·斯赫克尔迈耶(弗兰茨·斯赫克尔迈耶)。它即刻表明所有理性哲学家本质上不诚实:他们引进陌生的假定,它们既不是貌似有理的,也不是与持不同见解的对手进行辩论,而是嘲笑他们。色诺芬尼的追随者注意到了这个弱点。希罗多德和索福克勒斯写到诸神时就好像色诺芬尼从来就不存在一样,一些早期的科学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都批评了抽象的方法。

这把我带入了第三章的主题,即知识应当基于普遍的原理或理论。不能否认,存在着应用了相当抽象的概念的成功的理论。但是在断言它们存在之前,对于我们声称知道的任何事物的遥不可及的结论的本质,我们必须问以下三个问题:这些理论意味着什么(它们是描绘“客观现实”的普遍特征,还是仅仅帮助我们预言事物的性质是独立地决定的)?它们究竟具有多大的有效性(也许采用文字的理论永远都是不充分的,归属于它们的真正结果是在有待得到矫正的假定,即所谓的近似的帮助下产生的)?它们是如何得以应用的?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问,物理学、天文学或分子生物学的成功是否暗示了医学、国防或我们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应当包括比较客观和抽象的原理?

对第三个问题——科学理论如何被运用?——的回答是,发明、应用和改进理论的实践是一门艺术因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作为充满活力的事业的科学(是对把科学视为“知识的主

体’的反)是历史的一部分。装饰我们教科书的公式暂时冻结了流动历史溪流的活跃部分,它们必须被销毁,使历史的溪流重新焕发生机,以便被理解并产生结果。不管存在着多么基本的变化,正如这些时期的科学论文中表明的,它们都必须被销毁。诸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还是科学和艺术(科学和人类学)的相关区别,都不是真实事物之间的区别,而是真实事物(艺术、人类学、科学——所有这些在传统意义上都是真实的,或与真实相关的)与它们的恶梦之间的区别。

恶梦对于我们理解知识具有决定性却是仁慈的影响。如果现实被描绘成不仅独立于人类生活,而且并不包含人类生活的特征的话,那么人类心智又是如何触及它的呢?在人类的努力和他们的不可靠的结果之间难道存在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但是人类的心智确实达到了现实——科学试验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一点。企图提供一种沟通过程的理性说明(归纳理论和证明理论,先验唯心主义)是不成功的。它们看起来似乎要把科学家变成推理的机器和数据处理机。理论的捍卫者提出了一条简单的解决途径:科学家就像艺术家,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奇迹达到现实,这奇迹被称为创造性的跳跃。第四章表明,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讽刺,甚至对艺术也是一种讽刺。把科学当作历史的一部分去改变问题,或者把个人创造力的思想用来解决问题,这两者都行不通。

它也改变了科学和艺术的显著区别。对进步思想的结果在第五章中得到解释:不论在科学还是哲学中,进步的判断都是相对的判断。

已经追随我来到第四章结尾的读者会指出,我对理性和合理性的批判对于过去的版本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不再适用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第六章回答这个问题。它表明